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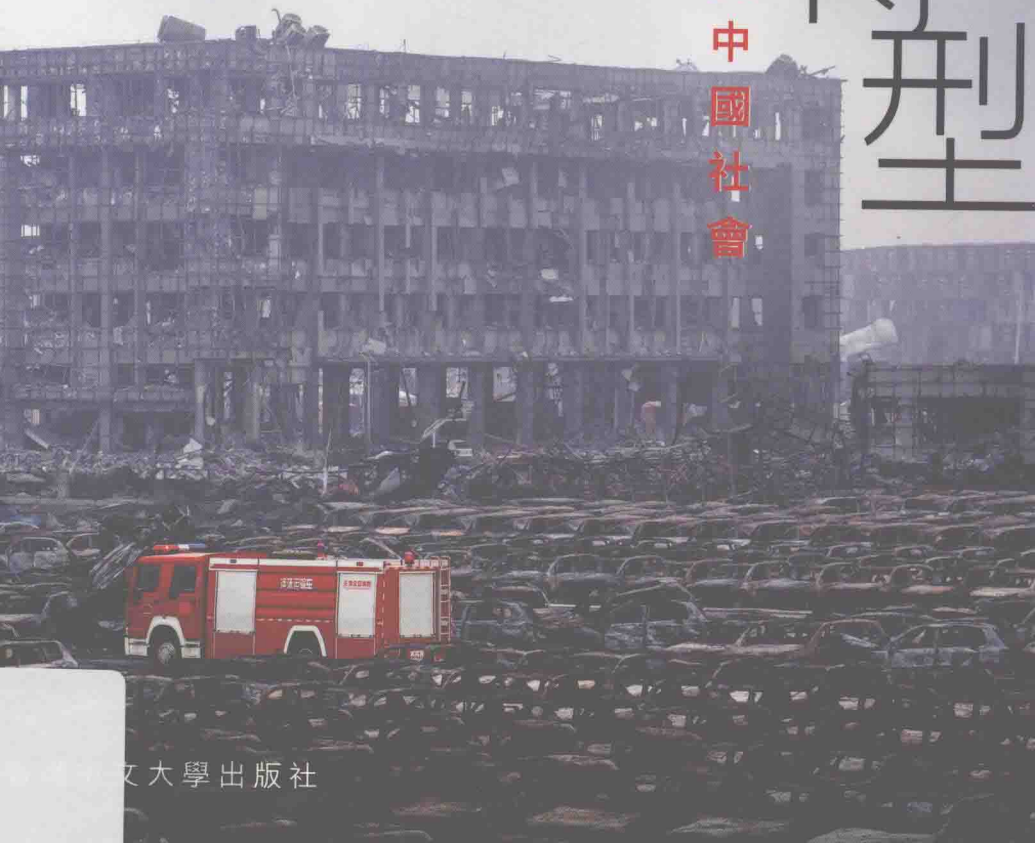
通識教育叢書



陳健民、鍾華 | 編

艱難的轉型

現代化與中國社會



中文大學出版社

艱難的轉型

現代化與中國社會

陳健民、鍾華 編



中文大學出版社

《艱難的轉型：現代化與中國社會》

陳健民、鍾華 編

通識教育叢書

叢書主編：張燦輝、梁美儀

© 香港中文大學 2016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978-962-996-691-1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學

傳真：+852 2603 7355

電郵：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upress.com

The Difficult Transition: Modernization and the Chinese Society (in Chinese)

Edited by Chan Kin-man and Zhong Hua

General Education Series

Series Editors: Cheung Chan-fai and Leung Mei-yee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691-1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
「通識教育叢書」

顧問

李沛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洪長泰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
張洪年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勞思光院士 (台灣中央研究院)
楊綱凱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編輯委員會

呂大樂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
周克勳教授 (化學系)
梁美儀教授 (大學通識教育部)
張燦輝教授 (大學通識教育部)
甘琦社長 (中文大學出版社)

「通識教育叢書」總序

今日人類文明，已進入全球化的「知識社會」、「知識經濟」階段，知識成為推動社會發展最主要的動力。耶魯大學學者肯尼迪 (Paul Kennedy) 曾指出，為面對21世紀全球社會的來臨作好準備，我們必須注重三大因素，第一個因素就是教育。¹ 當代大學兼具教育、研究和服務社會的多元功能，在知識的保存、傳授、發展、創造和應用等方面，都起著決定性作用。在追求國際競爭力的全球化過程中，大學作為知識傳播、產生的重地，和高質素勞動力的泉源，應該、也必然扮演更重要的前沿角色。然而大學是否只滿足於作為「知識工業」，製造社會經濟發展所需的優質「人力資源」？這問題所涉及的，就是大學應培養怎樣的人才，和大學本身的理念。

上世紀的美國大學，因應學術愈來愈專門化，教育設計愈來愈從工具理性邏輯的趨勢，率先推出通識教育，目的是彌補專

1 其他兩個因素是婦女地位和政治領導。Paul Kennedy,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339.

業教育之不足，培養「全人」或「通人」。在理念上，通識教育的價值和重要性一次又一次地備受肯定，在21世紀的今日，它不但並未過時，而且受到愈來愈多不同地區的大學重視。社會上許多職業團體，也深覺社會發展日趨複雜，知識日新月異，當前專業教育的發展有越趨深化之勢，從而，學科之間的通攝，行業內工作的運籌，在在需要跨學科領域的識見。因此，擴展學生的視野，培養學生對課程以外的問題探索的興趣和能力，實為大學教育之要務。肯尼迪就曾進一步指出21世紀教育的意義「不只是在技術上『重新打造』勞動力，或造就專業階層……它意味〔使人〕深入瞭解為甚麼我們的世界在轉變，其他的民族、文化怎樣感受這些轉變，我們彼此之間有何共通之處，以及是甚麼構成了文化、階級、國族的分歧。」² 這些課題，也正是通識教育希望學生關心、瞭解的課題。不過，必須指出的是，雖然在理念上通識教育不斷被肯定，在實際推行的時候，它卻往往被淡化甚至遭到忽視。有些在亞洲地區致力推動通識教育的大學，便曾有「沒有學生肯花精神去聽」、「沒有教授願意去教」和「沒有人願意去管」的「三沒有」之嘆。

香港中文大學自創校以來，便堅持大學所培育的人才，除了具有精專的知識，配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外，亦應擁有現代「知識人」的素質：包括對自己民族學術文化有一定的瞭解，對人類知識文化有基本的認識，有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以及對真、善、美等價值有所追求和執著。因此，通識教育自始即為中文大學學制中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當然，隨著香港社會的轉變和大學發展的需要，香港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也不斷演變。當初純由書院負責的通識教育，在1986年發展為大學與書院通識並

2 同上註，頁341。

行；其後雖因學制由四年轉為三年，通識學分的要求，或有所減少，但提供通識科目的老師與學系卻不斷增加。時至今日，通識教育可說是唯一由全校師生共同參與的課程。

要確保通識教育科目的素質，確立通識課程的受尊重性 (respectability) 十分重要：我們必須清楚傳遞「通識並非膚淺、普通常識的代名詞」這訊息。香港中文大學通識課程的教授來自人文學科、工商管理學、社會科學、教育學、工程學、醫學與自然科學等不同領域，他們開設的通識科目都有專業的深度和修養。可是，要將專門學科的研究成果，作出準確而有洞察力的綜合，深入淺出地介紹給沒有背景知識的同學，引發他們作進一步的探索與反思，實非易事。怎樣創設與教授優質的通識科目，對老師是很大的挑戰。所可欣幸者，香港中文大學有一群對通識教育具真切的興趣、並認同通識的信念、勇於承擔的老師，在繁重的本科教研工作之外，熱心發展通識教材，不斷提高通識科目的教學質素。

現在大學通識教育部將這些老師的心血結晶編輯成「通識教育叢書」，由中文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初步涵蓋天文、物理、哲學、教育、文化、藝術、統計、大眾傳播等不同領域。這嘗試一方面可補通識科目教材缺乏的不足，同時也使老師的教學心得，廣為傳播，加強學科專業之間、專家學者與知識大眾間的溝通，並可收同儕觀摩的效果。在此謹祝願叢書的出版，能推動本校的通識教育，百尺竿頭，更上一層。

金耀基

(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前言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狄更斯在《雙城記》這段話最好用來形容今天的中國。

由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短短三十多年間，中國已由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國民生產總值在2014年首次超過10萬億美元，其中工業生產總值佔了42.6%，¹可以說中國已是一個工業大國，甚至是「世界工廠」。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亦有顯著的改善。貧窮人口從1978年的2.5億大幅削減至2013年的8,249萬。²識字率亦由1979年人口的70%³提升至近年來的95%以上(Wang 1985)。現在大學畢業生的數目已攀升至每年約700萬。⁴無可置疑，中國已走上現代化的道路。

經濟發展和教育改善令中國有「底氣」在世界面前展示國力。2008年奧運會在北京成功舉行，開幕禮場面盛大，最後中國取得

1 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1/t20150121_671820.html

2 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n/2014/1016/c64387-25850085.html>

3 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4 中國教育在線：<http://www.eol.cn/html/c/2014znjyn>

51面金牌，成為全球第一的體育強國。2007年，中國發射火箭登陸月球，在航天科技方面取得重大突破。2011年，中國第一艘自製航空母艦下水，標誌著中國軍事實力的上揚，有必要時不惜亮劍。中國的崛起，自然令國際競爭對手神經緊張。美國加強在亞太地區的戰略角色，中日關係日趨緊張，南海亦難以安寧。但中國顯然仍以發展經濟、維持社會穩定為當前首要國策，一個和平的國際和區域環境才符合中國的利益。因此，更多的觀察家關注的並非戰爭的威脅，而是中國會否被內部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所拖垮。

在2014年四中全會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依法治國」的概念，反映近年中國出現的利益集團，在全國不同領域侵吞國家資產、掠奪農民土地、壓榨勞工，而「權大於法」和司法腐敗問題也日益嚴重，造成民怨沸騰，群眾事件不絕。習近平深明官商勾結已將國家引至危險境地，故此在執政後致力打擊貪腐，令多名國家級領導相繼下馬。但這種雷厲風行的反腐方式，由於不是從制度入手，容易令人聯想是藉反腐進行權力鬥爭。此外，改革的手段是先讓習近平集權於一身，壓抑媒體和公民社會的力量，以從上而下整頓黨風的方式去對抗利益集團，不單效果成疑，更令人擔心會造成政治與社會領域的倒退。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來的改革思路是「放權讓利」，由原來的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中央權力不斷下放至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招商引資成為考核地方幹部表現的標準，國有企業亦以創收而非為工人提供全面福利作為首要任務。這種權力下放和利益引導調動了幹部的工作動機，同時亦引發官員弄權、侵吞國有資產等惡果。在經濟領域，中國政府適時引入民營企業的競爭，視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組成部份」，將缺乏效益的集體和國營企業淘汰。不過基於意識形態和既得利益的

阻礙，大型國企的控股權仍然掌控在國家或相關高幹手中。在政治領域，中國政府卻完全沒有引入任何權力競爭機制。不單憲法上規定了一黨專政，連人大以至村委會選舉都受到中共的高度控制，令體制內的監督機制如同虛設。再加上政府對媒體和公民社會的限制，無法在體制外調動社會監督，地方官員更是專橫跋扈，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因此，「放權讓利」固然造就了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經濟奇跡，亦引發出眾多的政治與社會問題。譬如地方官員盲目招商引資作為政績，罔顧環保法規，容忍工廠污染環境，造成生態災難。又譬如地方政府喜歡以硬件建設作為形象工程，審批工程又涉及重大利益，提供貪腐的機會，結果是各地出現重覆建設、甚至建完重修的「豆腐渣工程」。社會學家更是關注權力下放會否加劇中國的社會分配不均。中國的堅尼系數已經連續十年超過聯合國提出的警戒線0.45（2014年官方數據為0.469⁵，民間統計則高達0.73⁶），可見經濟發展的成果並未能合理地分配。造成這種社會分配不均的原因，首先是城鄉的差距，其次是地域因素（沿海與內陸）。這不單是因為沿海城市有地理優勢，亦是因為國家對這些城市提供經濟優惠政策（如稅務減免）。各地政府亦因為稅收的龐大差距，更令內陸地區較難通過教育、住房、醫療、社會保障等「第二次再分配」去調和社會不均。因此，在90年代初有學者提出中央政府應加強財政收入，以強化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達到調和區域的差距，減少分配不公（王紹光及胡鞍鋼1994）。

隨後中國政府的確進行一系列財政改革，減少地方政府保留的稅收。但通過中央集中運用的財政資源是否有效促進不同地域

5 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1/t20150120_671037.html

6 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

較平均的發展機會？農村在基建與福利措施方面是否得到明顯的改進？這些問題仍有待研究。地方政府在上繳更多稅收到中央後，為了支撐地方的建設和維護官員的既得利益，卻出現更多官商勾結，騙搶農民土地的事件，令「土地流轉」成為當前農村的重大議題，亦是廣東「烏坎事件」的背景所在。

面對著中國這個幅員遼闊、地域經濟與文化差距龐大、已經實行分權讓利政策多年的國家，習近平以一種近乎「新權威主義」、從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去挑戰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其成效將會如何？習近平又能否超越黨內的監督系統和整風運動，建立獨立的司法系統去規範幹部的權力？他又能否更進一步依賴社會力量（包括自由媒體與公民社會），甚至是民主制度去制衡權力？這些問題不單涉及中國黨政一體的政治制度，更涉及這套制度更深遠的意識形態根源。而所謂的意識形態，不單是指馬列毛思想中無產階級專制的理論，還涉及多年來中國文化中對「多元思想」的抗拒。

遠者，可追溯至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如何經歷秦漢的高壓與收編而最終變成「獨尊崇儒、罷黜百家」的局面。近者，是中國於19世紀中面對烈強入侵，知識界出現「中國意識的危機」（林毓生1988），最終變成全盤否定儒家思想，轉而向西方取經以富國強兵，卻又痛恨西方霸權氣焰，內心矛盾重重。Benjamin Schwartz（1979）認為馬克思主義便是一種「來自西方而反西方」的思想，正能疏解當時知識分子忐忑不安的心理。今天中國雖已躋身世界強國之列，但百多年來的民族屈辱卻形成當前執政者與不少知識分子對西方霸權的防備心理。隨之而來的，是對民主、自由、多元、法治等源於西方的「普世價值」有所抗拒。特別近年西方國家面對金融風暴以及經濟衰退，也出現了對自身政治和經濟制度的種種反思；相比之下，中國卻成為「發展的孤島」，憑其龐大的市

場和總體財力縱橫國際政治舞台，更有自信談「中國模式」，包括以集權的方式進行反腐和「依法治國」的改革。

但這種自信是否有充份根據？中國模式是否可持續發展？習近平的改革是否能引領中國成一個強大而文明的國家？本書無法直接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期望讀者先了解當代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史脈絡、指導意識形態的轉變和每個領域最凸顯的問題，然後自己去探索中國何去何從的大課題。本書作者大多為中國研究領域的中青年學者，嘗試用社會學理論梳理各種繁複的社會現象，讓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中國社會」課程及其他有興趣了解當代中國的讀者，能在這「最好的時代亦是最壞的時代」中，以關懷和理性的態度審視自己的國家。

國際學術界研究現代中國社會的理論框架多種多樣，Norman Stockman (2000) 將其總結為四個主要角度：(1) 文化角度側重東西文明的對比；(2) 經濟角度視中國為龐大的經濟體，著重分析中國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3) 政治角度則認為中國是當今世界最主要的「共產」國家，更關注其意識形態和國際關係；而(4) 社會的角度或許最為綜合全面，社會學家們試圖跳出中國的「特殊性」，藉研究百年來中國各方面的「變」與「不變」來探索人類社會變遷的進程。本書採納這種社會的角度，試圖從多個側面向讀者描述真實的現代中國，讓讀者了解到社會發展每一步的博弈過程及其帶來的正面和負面效應，並通過綜合評介中西方的研究成果引發讀者進行多維度的比較和思考。

百年來的中國社會變遷，緊緊圍繞著中國幾代人對現代化的追求。儘管學界對現代化和現代性存在種種反思和批判，但至少從目前來看，「現代化」的社會形態仍是大多數人期望發展的方向，中國並非例外。從洋務運動到改革開放，不同年代的中國領導人與知識分子都認識到建立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性，也朝著這個

方向做出種種努力。研究現代化進程的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屬於「後發外生型」的現代化國家，在列強侵略的刺激下才被迫奮起革新。與「早發內生型」國家（英美法等）相比，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起點較低，又面臨著不平等國際秩序的掣肘和資源人才的局限，導致其發展道路不可避免地充斥各種曲折。此外，根據現代化理論解釋，現代化涉及了工業化、城市化、結構分化與整合、世俗化及理性化等多方面的社會發展，而這些現代化因素之間必然存在矛盾與衝突，因為社會中幾乎沒有兩個因素能夠以同樣速度適應劇烈的社會變革，比如經濟增長與收入平等的矛盾、政治穩定與政治民主化的矛盾，以及社會分化與社會整合的矛盾等等。早發內生型國家的現代化通常經歷了幾百年，這類社會可以通過較長的歷史時期去消化或逐步減輕各種矛盾；但後發外生型國家的發展速度過快，這些矛盾可能同時爆發，程度也可能更加嚴重。與許多後發現代化社會一樣，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也不得不面臨上述矛盾，並在矛盾的兩面艱難抉擇（Levy 1972; 孫立平 2005）。

基於中國屬於後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的事實，本書採用以上介紹的現代化理論框架，通過不同章節具體分析現代化的各個因素在中國的表現，希望有助於讀者了解今日中國各種問題之根源。全書分為十個章節，前兩章屬於綜合性的介紹，第三章至第十章為專題形式。**第一章**簡單回顧從清末至1978年之前的中國現代化之路，為讀者理解改革開放後的現代中國做好背景鋪墊。作者首先從政治、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四個方面介紹了傳統中國的特徵，但傳統中國自清末以降在西方衝擊下逐漸面臨存亡絕續的危機，有識之士先後進行了各種現代化艱難探索，上述四方面傳統逐漸解組並重構：新文化運動奠定了中國向現代化轉變的思想基礎，也因各種歷史原因使中國迅速接受了來自西方卻反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潮；而毛澤東時代則在多年戰亂後為中國贏得了完

整的主權國家地位和相對和平的國際發展環境，建立了足以發動和控制全面現代化改革的龐大政治體系，通過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快速推進工業化，並以高積累和犧牲農村為代價完成了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變。但這種「國家」現代化道路並未改善民眾的普遍窮困，也未保障個人的基本權利，解決國家與民眾之間的張力並釋放更多經濟與社會的活力，是後毛澤東時代的主要任務。**第二章**則梳理了70年代末以後中國政治和經濟改革的大脈絡，讀者就此可以了解中國在三十多年間迅速崛起的原因主要在於漸進式改革，即在保持政局穩定的前提下，通過強有力的政府發動大規模的變革，將有限的資源放在最迫切需要的地方以逐步實現經濟騰飛和社會進步，這也跟其他相對成功的後發現代化社會（比如日本、德國、台灣等）在發展初期走過的道路相似；但社會變遷過於迅速必然帶來很多矛盾，而且政治改革遠遠滯後於經濟改革，都對中國下一階段的現代化帶來巨大挑戰。

1978年以後的改革開放首先從農村包產到戶的制度革新開始，但時至今日，中國農村的現代化之路仍然迷霧重重。本書的**第三章**即聚焦於中國農村，希望讀者可以簡要了解農村社會三十年間的曲折發展道路，並探討目前面臨的各種問題及其根源。簡言之，中國農村改革自始至終面臨著地少人多的現實困難以及社會主義集體土地所有制的桎梏，優先發展城市的宏觀制度安排也造成了農村教育和社會福利的持續落後，無法吸引優質資源和人才，這種惡性循環甚至威脅到相對民主的農村政治架構。與第三章相呼應，**第四章**重點介紹改革開放以後飛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並強調中國城市化大幅度提升的主要動力來自90年代中後期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城市化水平往往與技術改革、經濟增長和民眾生活條件改善等正向社會結果相關，是反映一個社會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標，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超過50%，

達到世界平均標準。中國城市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東中西部發展水平差異巨大，大城市的過度城市化，以及農民工在城市權益的保障缺失。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明顯表現出更高的權利意識和融入城市的意願，未來的改革必須著重探索如何使農民工享有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待遇，賦予公民真正的遷徙和居住自由。

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後發現代化國家往往在追求快速增長的過程中無法兼顧平等分配利益。閱讀以上各章可以基本認識到：在毛時代，國家是城鄉二元結構的締造者，也製造了政治上的特權階層，但居民收入總體上差別較小；進入改革時代，國家和市場的共同作用進一步加劇了城鄉分化，拉開了中西部和東部的區域差距，90年代改革加速後更逐漸產生了政商結盟的巨富利益集團，與數量龐大的、缺乏向上流動機會的底層（農民和農民工為主）形成鮮明對比。本書第五章即詳細總結了中國目前的社會分層結構及其來源，並指出今日中國的社會流動仍然面臨強大的制度障礙，包括發達城市戶口和國家體制內「單位」的半封閉狀態、政治和經濟精英的代際世襲，以及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均衡。就現代化階段而言，中國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分化甚至呈現階層固化的趨勢，但缺乏有效機制調節各階層利益分配並充分給予底層向上流動的希望。建立新的社會整合系統，仍任重道遠。

社會高度不平等無可避免地帶來各種社會衝突，第六章首先概括了過去十幾年間中國社會不斷增長的群體反抗，矛盾主要集中在環境、勞工、教育、徵地、司法和健康等方面，官民關係日趨緊張。同許多後發現代化社會一樣，中國政府選擇了強調政治穩定以保經濟增長的現代化之路，意味著在這一發展階段未顧及政治民主和收入平等。國家層面針對此類民生問題的制度性改革因而進展緩慢，主要以維穩手段強行解決各種爭拗。但是，中國

民間的力量並未就此沉默。社會經濟的進步使一部份普通人的公民意識覺醒，公民社會逐漸崛起，成為自下而上推動國家進一步現代化（特別是促進政治民主進程及達成社會整合）的重要力量。第六章接下來重點介紹了西方公民社會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歷史，以及中國公民社會近年來的成長和發展情況。當代中國既需要公民社會在緩解社會衝突時的中介作用，也需要公民社會強化弱勢群體的有組織抗爭能力，並對宏觀政策及社會整體風氣進行全面監督和倡導。

新一屆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以維穩手段無法從根源上緩解社會矛盾，下一階段改革的目標必須包括減少收入差距，並建立一個相對公平的司法系統使人們可以在法律框架下解決爭議。本書第七章即聚焦於司法問題，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國的犯罪趨勢，然後詳細介紹了中國的司法現狀及其面臨的挑戰。學界早有共識，犯罪率的升降遵循一定的社會發展規律，在高速現代化過程中，由於社會失範及社會不平等等原因，很多國家在現代化早期都經歷了各種犯罪大幅增加的歷史階段。中國的犯罪率自80年代末開始上升，21世紀初以後增長速度才有所放緩，嚴重暴力犯罪甚至出現了小幅度的下降，這也許意味著部份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已經走過了現代化早期。目前中國的總體犯罪水平在全世界屬於中下游，但某些犯罪類型依然需要全社會高度重視，包括農民工及其下一代的越軌與犯罪、恐怖主義犯罪、有組織犯罪以及毒品犯罪。控制各種犯罪和越軌行為既依靠正式的司法系統，也離不開非正式的社會觀念和組織。中國大陸民眾的法治意識總體上依然淡薄，傳統社區和家庭起了重要的防範作用，很多衝突也會訴諸民間方式而非官方訴訟。至於正式的司法系統，主要包括警察（公安）、法院、檢察院和懲教部門（監獄）等。當前司法系統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黨」大於法、專業性不足，以及因缺乏透明度和監督導

致司法腐敗和違反人權事件頻發。法治程度也是衡量一個社會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所以中國的司法改革從未停止；但如果不進行根本上的制度調整，賦予司法相對獨立性並建立有效的公眾監督機制，中國的司法系統只能是黨國官僚體系中的附庸。

中國在過去百年間的巨大變遷，除政治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和經濟現代化之外，也包括了人口結構以及社會生活層面逐漸從傳統邁向現代。少子化、老齡化、核心家庭增多及消費主義盛行等等轉向在先發現代化國家基本是自然形成的，但在後發現代化社會的發展中處處離不開國家的影子，中國尤為明顯。第八章側重於分析中國1949年至今的人口轉變、健康狀況以及兩者所面臨的問題。在毛時代，中國終於結束了長期的戰亂，直接導致生育率劇增；而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干預也使全中國的衛生健康水平迅速提升，人口死亡率隨之大幅下降。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這一歷史時期的人口迅猛增長帶來了沉重社會壓力，改革開放後政府立即嚴格推行計劃生育政策。計劃生育雖然確實有效地抑制了人口增長，但也帶來很多社會經濟問題，包括提前進入老齡化社會而尚未做好養老的財富儲備和制度安排，勞動力人口下降（人口紅利消失）而依靠大規模勞動力的經濟模式尚未完成轉型，在傳統農村執行計劃生育造成的官民衝突，男性偏好導致的長期性別比失調甚至危及未來幾千萬男性的婚戀和整體社會穩定。雖然毛時代建立了相對平等的覆蓋城鄉的基本公共醫療制度，但1978年後的市場化改革減少了對公共醫療資源的投入，前文提到的社會不平等也包括了醫療健康資源分配不合理，導致農村居民及流動人口缺乏醫療保障，他們也面臨更多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健康風險遠高於其他階層。

國家在不同時期的人口及政經政策同樣影響到中國家庭的轉變，第九章大致梳理了幾千年來形成的傳統中國家庭如何逐步適